



跨越时空的 天地对话

◎汪微

重读《唐开元占经》，我仿佛听到印度籍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在大唐古都长安整理典籍时笔端发出的窣窣声，看到中国古代天文学先驱甘德、石申、巫咸氏等在萧瑟的寒夜中仰望星空、记录天象的忙碌身影。

这部厚重的典籍由瞿昙悉达执笔，不仅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活化石”，更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对浩瀚宇宙永恒的好奇与孜孜不倦的探索。它不时提醒我们，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离不开前人的积累与传承；文明的延续既需要理性之光，也需要对未知保持虔诚与敬畏。

《唐开元占经》保存了《甘石星经》《灵宪》《浑天仪注》等早已失传的中国古代天文学文献，以及唐以前大量的天文观测记录、历法数据及星表。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提供了最早的木星卫星肉眼观测记录，即甘德于公元前364年记载的“岁星同盟”现象：“单阏之岁，岁星在子……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被学界认定为木卫二的最早观测记录，比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早了近两千年，为后世的天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与参考。

书中保存的古老恒星位置观测记录与《石氏星表》所显示的精确数据与坐标，无疑是人类探索宇宙历程的重要里程碑。公元前440年，石申对121颗恒星的赤道坐标测量数据，与古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的星表几乎同时诞生，而且得以完整保存。另外还广泛涉及宇宙结构、历法推算、气象地理等多个领域，其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令人叹为观止。该书关于日蚀等天文现象的观测方法与科学解释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更体现了古人勇于探索、敢于质疑的精神，这种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态度对后世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阅读《唐开元占经》的过程中，我不仅被它深厚的学术底蕴所吸引，更被古人那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所感动。这部典籍不仅是一部科学著作，更是一部承载着古人智慧与精神的文化瑰宝。它提醒后来者应始终保持对天地宇宙的敬畏与好奇，不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未知，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去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

《唐开元占经》成书后曾一度失传，直到明万历年间有人在古佛肚腹中发现抄本，才得以重新流传，至清代又被收入《四库全书》。应该说，该书承载着古人对宇宙的探索与对命运的思考，为后世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时至今日，在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唐开元占经》依然能持续激发我们的深度思考：如何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更好地守护那些承载文明密码的古老智慧？或许，答案就隐藏在古哲先贤为“观天授时”而坚守的那份对大自然的虔诚与执着中……



《美女与野兽》

插图选(4)

沃尔特·克兰 绘

美妞看见野兽
躺在草地上。



“五四”时期作为文学共同体的 周氏兄弟(1917—1923)

王海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从作为“共同体”的周氏兄弟入手，一方面指出二人在文学革命过程中的紧密配合与分工合作，另一方面又借此进一步明确了二人各自独特的文体表达与思想内涵。全书兼具历史的细密与思想的深度，从文学实践入手，最后返回到周氏兄弟的精神复调谱系之中。

底色

吕欣 著
新星出版社

画家通过繁复的单黑线条与强烈的明暗对比，刻画出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通过描绘原始部落“第一位”艺术家的生平，探讨了艺术的起源，致敬艺术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起源”故事，更是关于艺术、生命和人类文明的哲学思考。

自然权利与美国想象: 小说中的 政治哲学

[美]凯瑟琳·祖克特 著
商务印书馆

美国经典小说中始终徘徊着“向自然回归”的主题——主人公以抗争态度逃离市民社会，到自然中寻求美好生活，最终以重返一个更好的社会为结局。祖克特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命题“自然与习俗”切入，对这一美国文学中的独特意象做了谱系化梳理。

何以汉服: 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 服饰

左丘萌 著/立青 绘
岳麓书社

本书深入探讨马王堆汉墓出土服饰背后的时尚演变、穿着礼制、社会特点等。依据色彩等级(如绛红、皂色的使用规制)、纹样寓意(茱萸纹象征长寿、云气纹暗含升仙思想)、剪裁细节(曲裾深衣的续衽钩边体现身体遮蔽礼仪)体现服饰是维系社会等级的“显性符号”。

《槐聚诗存》编年问题

◎叶沃若

艾俊川《E考据故事集》里有一篇《是谁介绍钱锺书与卢弼相识？》，谈到钱锺书一九五五年与卢弼通信时附抄的诗稿。第一封信后的“近作一律”，《槐聚诗存》中系于一九六六年；另一封信后的“近作一律”则系于一九四九年。两首“近作”的系年，一推后，一提前。艾俊川由此认为，“《槐聚诗存》的编年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其实，《槐聚诗存》出版之初，范

旭仑、刘衍文等人都注意到这一现象。《容安馆品藻录·冒景璠》中也提及上述两首七律。范旭仑认为，系年推后的一首经过修改，“当是故意”；另一首则是“恶作剧般地将写作时间提前”。

近日翻阅《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见黄伟经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写道：“钱老大病前曾先后用毛笔赐过我三个条幅，都是他的诗：《阅世》(一九八七年七月写来，还



鲁迅所谓“女官公”

◎苏姝

1918年1月4日，鲁迅致函许寿裳说，“女官公则仄仄无生意”。次年1月16日，又去函说，“闻燮和言李牧斋贻书于女官首领”。据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女官公”“女官首领”所指为同一人，即时任教育部总长的傅增湘。至于鲁迅为何有此代称，王景山说，相传太平天国有位女状元傅善祥乃杨秀清东王府女簿书，“姓相同，名字音相近。这大概就是鲁迅、许寿裳等以‘女官公’‘女官首领’代称傅增湘的来由”。唯此言辞之间似乎不大肯定，是以未尝不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

1915年12月，大总统袁世凯通电全国，复辟帝制，为了彰显新帝国与旧王朝的不同，还陆续颁布了一些新政，包括革除太监，“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而据当年12月28日《时事新报》报道，“选用女官办法，日前，公府(指总统府)传令特召傅肃政史增湘及其夫人入内咨询意见”。本来制定选用女官办法乃政事堂职责所在，而肃政史与前代的御史类似，以弹劾为本事，可谓八竿子打不着，但袁世凯如此特召，在名义上固然是傅增湘与凌万籟夫妇均有办理女学经验，如傅增湘“前清时曾任北京女子师范校务”，而吕碧城倡设北洋女子公学，“凌夫人力赞之”，实则傅增湘乃袁世凯的“私人”，顾而问之，可得随指阿从。没过多久，选用女官办法由政事堂拟定。当时，鲁迅已然在教育部供职有年，身处中枢机构，除了报章所见，自然还能听到更多详情乃至秘辛，那么，他把始作俑者这笔账明确地算到了傅增湘头上，估计也无所谓冤枉。

此外，据周作人追忆，当年“叶德辉忽发奇想，在民间征发了五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说要训练了送到洪宪宫中去当女官，他在地方上很有势力，老百姓哪敢反抗。不久帝制被迫取消，女官已用不着了，可是叶德辉自己‘先都用过了’，随后再打发他们回家去”，则不免令人发指矣。



有两份呢——一份是他最初写出的，另一份是他改定的，《新岁见萤火》(也是一九八七年七月我恳求他书赠)和《重九日雨》。获赠时间重复两次，大概不会有错。但那首《阅世》收入《槐聚诗存》时，系年推后了两年。

《槐聚诗存》是钱锺书晚年“自定诗集”，经过“选定推敲”。系年与最初抄示或刊布时间不一致，原因较为复杂。从编定者的角度看，关注点应该在编年的经历和态度吧。